

■关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从戏剧舞台的一角窥探时代脉动

刘小波

**提示** 从一个穷山沟的放羊娃,到红遍全国的秦腔皇后,一代名伶如何长成?从拜师学艺,到名噪全国,再到戏尽落幕,经历怎样的百味人生?戏曲的舞台上没有常青树,但是生活总要继续下去。历史进程的大戏既在舞台上上演,更在生活中直面扑来。《主角》用秦腔艺人的视角串联起了整个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个体命运沉浮附着在时代的巨变之上。小说透过舞台艺人的经历,来演绎时代的巨变和人世的沧桑,告诉你谁才是生活的主角。



《主角》陈彦著 作家出版社

《主角》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叙写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遭际。围绕在她周围的,还有上百号称之为配角的小人物、小角色。作者陈彦采用了一种较为独特的叙述方式来书写底层人物命运,即用史诗笔法为底层代言,为小人物呐喊,这是文学深度介入生活的表征。陈彦以自己熟悉的戏剧领域为题,关注普通个体,关注芸芸众生,传递出了一种文学固有的温度。同时由于作品涉及领域的特殊性,使得《主角》蕴含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史诗笔法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时间跨度和空间的铺陈上。小说的时间节点从放羊娃易招弟被舅舅接走开始,到最后成为一代名伶,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在作品中闪过,种种历史变迁都在和她发生着共鸣和共振。从个体角度而言,小说的时间跨度从忆秦娥幼年拜师学艺开始书写,到功成名就,再到舞台生涯黄昏的生命历程,又从忆秦娥写到她的下一代宋雨,时间跨度极大。再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作品从改革开放一直写到当下,对近半个世纪的时代风云变化也有较多的着墨,用秦腔艺人的视角串联起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个体命运附着在时代的巨变之上。

除了时间的跨度,小说的空间铺陈也很开阔。作者试图通过戏剧舞台生活的一角,窥探一个时代的脉动与一个群体的生命律动。但小说又不仅仅局限于舞台

这一方天地,作品的叙事场景在不断扩展拉开,既有乡村,也有都市,既有国内,也有国际,既有情场,也有生意场。整部小说有两条大的主线,一条是忆秦娥一步步成为秦腔名伶的打拼故事,另一条是忆秦娥周围人的生存故事。小说以人带事,以点带面,描摹众生百态,书写世间万象。

史诗的笔法也体现在作品的文化底蕴上。陈彦常年耕耘于戏曲界,对此领域的熟悉使得其作品充满浓厚的民族风韵。他的每部作品在写人的同时兼及文化,《主角》的底蕴也源于传承有序的秦腔文化根脉之上。比如小说中对“存”字辈的“忠孝仁义”四位各怀绝活的老艺人的描写就是这种书写,这并不是闲笔,而是与传承有关。

史诗笔法最后的落脚点却在一个个普通的个体上。作品着重心延续作者一贯以小人物为中心为底层人物立传的写作模式。主角忆秦娥虽然后来成为戏剧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她仍是真正意义上的底层人物,从刚进剧院从事帮厨喂猪的最底层工作、住在灶门口,到拜师引争议等描写都是这样。从她的命运来看亦是如此,忆秦娥仿佛从一开始就被牵着鼻子走,相继被师父挖掘,被选进县委领导层,被省级别剧团引进等。她自己本身更多的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小时候险些被性侵犯的经历让她对爱情和异性有着天然的抵触心理,这些不幸的经历笼罩影响了她的一生。

《主角》是为一个主角立传,聚焦的是舞台上的人。但在这部小说里,传主又颇多,不仅是一个忆秦娥,围绕着她也都是以自己生命为轴心的主角。诚如作者所言,小说涉及二三百号人物,他们都在自己的轮盘上争当主角。小说一开篇就描写了胡彩香与米兰的角色之争,即使是厨房的大厨、二厨,也不免有主次之分。小说名为“主角”,其实并未放弃关注配角,全书涉及几百个人物,有篇幅的区分,但没有写作态度上的差别。除了忆秦娥这一主要人物,小说对其他人物也有精彩刻画。这些人物很多都是处在底层的,作者在创作谈中也指出,一个主角依靠的是一个团队一连串如行云流水般的协同动作才把主角天衣无缝地送上前台。

底层写作可以说是陈彦小说最大的特点与亮点。从《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和《装台》中的刁顺子这些人物的身上,都能感觉到底层人物的挣扎与奋斗,坚韧与顽强。他的作品总是着力展现这些身处生活底层的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让人们在对其满怀爱与怜悯的同时,生发由衷的敬意。或许,作品还透露出一种普通人才是生活的真正主角这一意味,这也是其底层写作一以贯之的基石。即便是主角,在作者看来,也是整个行当吃苦最多的人,这种基调夯实了作者对底层人物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精神的歌颂与褒

奖。小说表达了一种生命的坚韧,作者笔下的世界不乏人世的苍凉及悲苦之音,却在其间升腾出永在的希望和精进的力量。底层人凭借努力,依靠泪水和汗水,一步步走向成功,实现人生价值。

为小人物立传是陈彦书写的旨归。陈彦长期从事戏剧工作,对这一行业有着深刻的认识,也有着特殊的感情。虽然他的作品多以从事戏剧工作的人物为中心展开,通过人物的书写,对所有底层人物表达关怀,并将其提升到人类共性的高度。《主角》较之前几部作品更为成熟,叙述更为老到,思考的问题也更多。丰富复杂的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和叙事的精准与老到。作品努力寻找人性的闪光点 and 人类温暖的一面,为底层人物带去心灵的慰藉。从作家的戏曲观,也能一窥其文学观。陈彦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了戏曲离了“草根性”必将寸步难行的观点,“凡能长久存活者,一定带着民间视角,带着浓浓泥土与灶火气——戏曲是草根艺术,得为草根代言。”正是这种为草根代言的理念,让他在创作态度上并未因为自己描述对象的卑微而选择另一种叙述方式,相反,作家用宏大叙述的手法来为小人物立传。文学是属于每一个个体的,普通人不一定能接触文学,但是文学不能不关注每一个个体。(作者系《当代文坛》责任编辑)

## 做一回“汉字控”

祝新宇

北大校长林建华把鸿鹄志读成鸿“浩”志,余秋雨把仁者乐山读成仁者“lè”山(正确读音是yào),被热搜很久了。汉字有多少?最新版《新华字典》收录1.3万余字,第六版《辞海》收录近1.8万个单字。而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收录9300余字,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的《康熙字典》则超过4.7万字。一字多义,一字多音,一字多体,乃至外表“形神俱似”的字众多,念错一两个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两人,一个是北大校长,一个是文化学者,何况鸿鹄志与仁者乐山属于中学知识,这也说明了汉字的复杂程度,以至于《语文月刊》每年都要出炉一批容易读错、写错、用错的字和词语。虽然有人声称带一本字典去孤岛,若真如此,面对毫无感情色彩,没有情节的字典时,他恐怕更愿意去看荒凉的孤岛吧。因此,有关汉字的书,莫不以趣味为旗号,连外国学者也不例外。比如瑞典人林西莉的《汉字王国》,日本人白静川的《汉字百话》。2009年,台湾作家张大春出版《认得几个字》,通过父亲在与孩子互动时,介绍一些汉字知识,童趣盎然。张大春的这本《见字如来》亦可用阿城称赞《认得几个字》的

话来形容,“有体温”。《见字如来》每说一个字或词语,都要先说一段故事,这些“生活中的小风景、小际遇,多少和后文之所牵涉的字符构造、用字意义、词语引申等有关。一部分甚至与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有密切的联系。”宋及其以后的说书人,在正文开始前,先说一段小故事作为引子,名曰“得胜头回”。张大春采取这个方式来说字,不仅取其强调趣味与吸引读者之意,且让所说之字灵动、具象起来,呆板单调的一个个字,从此有了“体温”。也因此,此书分了三辑,曰“见自我、见故人、见平生”。

张大春已过半百之年,他引用马尔克斯的话,“年老,就是感觉到器官的存在。”即使常年锻炼,腰间也生赘肉。他有了刘备“髀肉复生”的感觉,由此说到楚王好细腰的典故,进而引出主题:“肥”字的前世今生——是谓“见自我”。

张大春以小说著名,传统评书说得也不错,毛笔字亦好。20岁那年,父亲带他去拜访一位姓贾的书法前辈。前辈看出张大春父亲对儿子的厚望,便说了一句令他记忆深刻的话,“中国人坏就坏在望子成龙。”文章便羚羊挂角般

地谈起了“龙”字。十多年后,张大春在北京与贾公相逢,感慨颇多。后者还被他写进代表作《城邦暴力团》。究竟是“龙”字让作者想起了故人,还是忆起当年往事,必须要说说“龙”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字与故知产生了有机联系,是谓“见故人”。

从1995年起,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一个最能表现当年度世态人情的汉字。不知从何时起,大陆和台湾也开始流行“年度字”了。例如2011年选出了“控”字。无独有偶,张大春赴美国参访,听到英文也有相同的说法。只要是喜欢某个事物,便可称为“某某控”。一个“控”字,传神地表现了现代人“近乎强迫性地做某桩事”的特征。张大春感叹,“与其说‘控’字反映了一种社会上的不安之感,不如说电脑和网络的普及,为这个‘控’字带来了最大范围的掩护,以这个字代表社会的共同感受,并不只是觉得身受环境制约,而是出于自主的个人也实在有不能自主的处境。非上网不可吗?好像是。”简单的一个“控”字,见到了“平生”。

为了加强读者印象,张大春在每篇文章后出题考试。这一考不要紧,考得我

一身冷汗。汉字果然博大精深,很多看似正确的知识其实是错误的。例如,讲“肥”字那一篇,有题考心宽体胖的“胖”,这里的“胖”并非做“肥”的解释,而是安泰舒适的意思,读音是“pán”,而非“pàng”。我想,这道题那位北大校长也做不对。早年间,有文化名人在某杂志开过类似的专栏,叫“字词辨正”,里面便有十道四选一的选择題。当年上初中的张大春对此很痴迷(可称之为“汉字控”),“常因为自己的答案错得离谱而哈哈大笑”。我非常赞同张大春对汉字的体认:“许多字不只是具备表意、叙事、抒情、言志的工具。在探讨或玩味这些字之时,人们往往会回到最初学习或运用这些字、词的情境之中,那些在生命中有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的光阴,那些被现实割据成散碎片段的记忆,那些明明不足以沉淀在回忆底部的飘忽念头,那些看似对人生之宏大面向了无影响的尘粉经验,也像是重新经历了一回。”

读《见字如来》,我们会和作者一样,展颜、低吟,或者回首往事,在汉字中体验人生,于经验里品味汉字。做一回“汉字控”吧,你会发现,这是非常小、非常自我的美事一桩。

《见字如来》英文版问世的1999年,李欧梵也出版了描写上海都市文化的《上海摩登》。2004年,《霓虹灯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两部著作在美国获得了一致好评,国内待遇却截然不同。《上海摩登》获得了国内学术界圈内的一致追捧,成为上海“怀旧热”的经典读本。而描写上海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霓虹灯外》,却落寞很多。随着近年新文化史成为学界热点,《霓虹灯外》也在2018年9月再次出版,引起广泛关注。或许,只有经过了光怪陆离的想象之后,我们才会真正认识到,旧上海日常生活的主体,正是霓虹灯外的芸芸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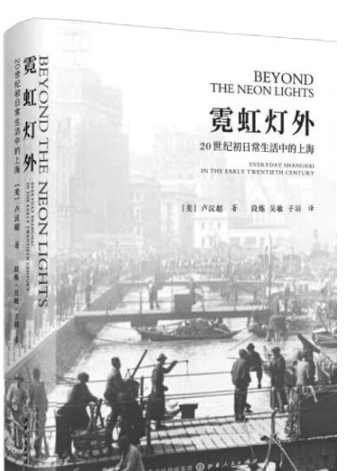
《霓虹灯外》英文版问世的1999年,李欧梵也出版了描写上海都市文化的《上海摩登》。2004年,《霓虹灯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两部著作在美国获得了一致好评,国内待遇却截然不同。《上海摩登》获得了国内学术界圈内的一致追捧,成为上海“怀旧热”的经典读本。而描写上海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霓虹灯外》,却落寞很多。随着近年新文化史成为学界热点,《霓虹灯外》也在2018年9月再次出版,引起广泛关注。或许,只有经过了光怪陆离的想象之后,我们才会真正认识到,旧上海日常生活的主体,正是霓虹灯外的芸芸众生。

《霓虹灯外》英文版问世的1999年,李欧梵也出版了描写上海都市文化的《上海摩登》。2004年,《霓虹灯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两部著作在美国获得了一致好评,国内待遇却截然不同。《上海摩登》获得了国内学术界圈内的一致追捧,成为上海“怀旧热”的经典读本。而描写上海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霓虹灯外》,却落寞很多。随着近年新文化史成为学界热点,《霓虹灯外》也在2018年9月再次出版,引起广泛关注。或许,只有经过了光怪陆离的想象之后,我们才会真正认识到,旧上海日常生活的主体,正是霓虹灯外的芸芸众生。

# 老上海生活主体是霓虹灯外的百姓

王鹏飞

**提示** 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翻开各种史籍,平凡大众的衣食住行,踪迹寥寥。数千年的历史如此,百年前的上海史也是如此。但提及那时的上海,无论文史著作,还是影视作品,浮现出来的多是呼风唤雨的海上阔人。似乎霓虹灯下这群人的衣食住行,就是老上海生活的主体。那么霓虹灯外的世界呢?卢汉超的《霓虹灯外》,将视角对准中下层上海人,讲述了一段被历史近乎遗忘的日常。



《霓虹灯外》卢汉超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三国后期,晋国名将羊祜镇守荆襄,经常到当地名胜岘山游览。有一次,这位羊太傅悲从中来,涕泣言道:“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羊祜苍凉的生命意识,引发了同行者与后人的共鸣。唐代诗人孟浩然有感于斯,写下了《与诸子登岘山》的名诗,感叹“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两位担忧湮灭无闻的人物,因为立功或者立言都留在了历史之上,而那些陪同登山的人,却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以致后人提到岘山,会有种恍惚感,仿佛千年登临的只有羊祜、孟浩然等寥寥数人。多年来,我们都活在这种简约化的历史记录之中。这种历史模式曾受到质疑。1930年,胡适在《上海小志序》中写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的大仇敌。什么是大?什么是小的……《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栏’或者一句女子‘蹊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得多了。”其原因,就是后者关系日常大众的生活状态,关系整个时代文明的性质。

胡适的疑问,反映了一种平民文化史观的自觉,但历史的书写又往往遵循长期形成的精英传统。比如20世纪上半期的上海,虽然是城市史研究的热点区域,可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依然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从这点来

看,《霓虹灯外》显示出别样的学术价值。1999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博士、现任乔治亚理工学院艾伦人文学部教授的卢汉超,对上海里弄和棚户区的中下层居民进行了审视。《霓虹灯外》从多个方面揭示了上海中下层百姓的生活状况,显示出与传统上海城市史研究精英视角的不同。正如史景迁所说,《霓虹灯外》再现了拥挤但又充满生机的上海里弄家庭,他们构成了旧上海的主体。他为我们唤回了商贩和收菜工的吆喝,日常的购物及上学、男欢女爱和穷困苦难的韵律,再现了房间和阁楼的布局、空间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共产主义的兴起和犯罪的普遍性。”这种细致的描写,使《霓虹灯外》成了20世纪初期魔都上海的《清明上河图》,也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上海人意味着什么”,“如何恰当地运用西方的观念去了解中国城市中日常生活”等学术问题。

1970年以来,西方史学界对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进行反思,反对经济、政治等决定历史发展的机械唯物论,强调微观文化对于宏观历史的决定作用,重视对边缘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研究。《霓虹灯外》就产生在这种思潮之下,无论是梳理里弄的众生相,还是探究大众日常衣食住行的研究,都有很浓的新文化史观印记。

《霓虹灯外》是一部精深的历史学著作,读起来却一点也不晦

涩,行文中,会看到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如王映霞跑几里地去购买郁达夫喜欢吃的蔬菜,底层妇女周春兰如何用一把菜刀杀死了丈夫,文艺青年在亭子间畅谈性与文学,弄堂里一大早人声鼎沸地刷马桶,半夜吊下篮子购买消夜等,都是富有画面感的故事场景。其实讲故事,强调史学的“文学性”,正是新文化史的另一特点。史景迁、孔飞力、魏斐德、卜正民等学者以及华裔史学家黄仁宇、王笛等,都具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述能力。在国内受业于文史名家唐振常先生的卢汉超也不例外。在一个个具体可感的故事之中,日常生活跃然纸上,历史也变得生动好看,面目可亲。

傅斯年曾言“史学即史料学”。对中下层上海市民此种此前极少被关注的研究对象,如果没有庞大的史料作为支撑,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论述。就这一点而言,《霓虹灯外》的史料功夫颇为出色。美国学者周锡瑞也由衷赞叹,“这项庞大研究的细节密度和文献记录的完整性让我心生敬畏”。翻阅全书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一个词,如“瘪三”“洋泾浜”“黄包车”,或者简短的一句话,如“广告多数张贴在弄堂入口处,或者弄堂附近马路的电线杆上”等,都有确切的著作或者报刊来源,体现着小心求证的史家作风。

《霓虹灯外》的写作中,卢汉超运用了实地采访、统计调查等多种社会学科的方法,著作的附

录《一项对于上海居民背景的调查附录》《被采访者情况列表》,也是典型的社会学路径。这种处理方式,深受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影响。传统的史学属于人文学科,强调文史哲不分家,黄宗智则尝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被视为将社会科学理论引入中国史研究的佼佼者。卢汉超毫不讳言,“我的《霓虹灯外》一书在方法上受他影响”。因此《霓虹灯外》除了被历史学界看重之外,也经常被列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书目中。新的方法自然会得出新的结论,卢汉超的调查告诉我们,号称“魔都”或“十里洋场”的上海,在中下层民众中更多地保留着中国传统,而不是霓虹灯下的洋派生活。

《霓虹灯外》英文版问世的1999年,李欧梵也出版了描写上海都市文化的《上海摩登》。2004年,《霓虹灯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两部著作在美国获得了一致好评,国内待遇却截然不同。《上海摩登》获得了国内学术界圈内的一致追捧,成为上海“怀旧热”的经典读本。而描写上海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霓虹灯外》,却落寞很多。随着近年新文化史成为学界热点,《霓虹灯外》也在2018年9月再次出版,引起广泛关注。或许,只有经过了光怪陆离的想象之后,我们才会真正认识到,旧上海日常生活的主体,正是霓虹灯外的芸芸众生。

■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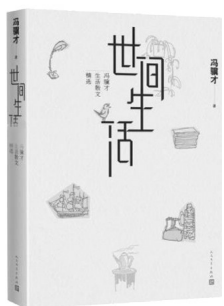
## 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春困秋乏。天气凉爽后,每天都感觉睁不开眼睛,睡意难消。

波拉尼奥说,书是世上最好的枕头。瞌睡打盹儿时,挑本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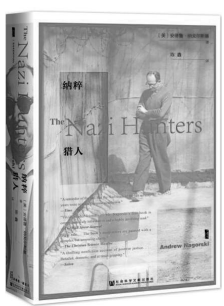
本期书单的主打推荐是《世间生活》——作家冯骥才的散文集,辑录了他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散文,涉及的内容有感慨岁月时光,也有记录旅行印象,包含了《珍珠鸟》《灵感忽至》《往事如烟》等名篇,也收入了《结婚纪念日》《房子的故事》等近作。难得之处在于,冯骥才的散文体现了他生活上的雅趣,在写作之外他喜欢遛摊儿、寻找古玩收藏,也热爱绘画和书法,对写作和绘画时间的分配基本上是随性而至,听命于生命的需要——“在写作到最充分时,便想画画,在作画作到最满足时,便渴望写作。”冯骥才说:我相信,真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非虚构作品,我们本周推荐的是《纳粹猎人》。二战结束后,大部分德国人迫切地想要忘记刚刚过去的历史。那些没有被立刻逮捕,或已经被盟军抓到却没有一开始就被识别出来的主要战犯,没有任何赎罪的想法,逃跑成为他们多数人的选择。为了使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不让世界遗忘纳粹的罪行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训,有一小群人付出全部努力,试图追究到底,将这些杀人犯绳之以法,无论他们逃到了哪个角落。这群人被称为纳粹猎人。基于档案文献和对当事人的采访,《纳粹猎人》还原了不同“纳粹猎人”的故事——这一群人中既有官方人士,也有民间个体,甚至彼此之间还会发生矛盾,但他们所做事情有着一致的目标,那就是让世界不要忘记纳粹的罪行,促使读者去思考战后审判的意义以及“纳粹猎人”的存在价值和他们行动的正义性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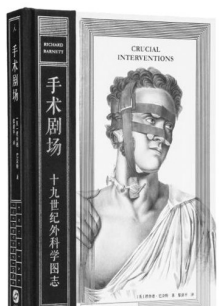
●《世间生活》

本书收录了冯骥才的散文经典60余篇,有作者对人生中的某些重大际遇或亲友交往的感慨之作,也有对世事的看法和感想,还记录了作者工作之余的生活趣味,有书画音乐,更有遛摊儿寻宝、香烟美食,幽默风趣的文字,流露出他“物皆有情”的真情感悟;不仅写了春夏秋冬、花鸟鱼虫,更有世间之人、人间之情,还收录了冯骥才游历国内外的自然散文,国内多地的走访名为旅游,实则文化守护之旅,冯骥才的文化担当和责任意识也在其间悄然显露。



●《纳粹猎人》

在纽伦堡审判结束,战胜国失去了起诉纳粹战犯的兴趣,比起思考赎罪,他们更加迫切地想要忘记刚刚过去的历史。大量低级别罪犯混入了渴望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而自绝出境更危险的战犯则逃离了欧洲大陆。被称为“纳粹猎人”的一群人决心找寻其踪迹。最初,他们想要复仇,尤其是那些来自集中营的,或曾经帮助过解放集中营的人,他们目睹了纳粹杀人的惨状。但不久之后,复仇就变成了了一场寻求正义的不懈斗争,追捕战犯的行动最后变成了法律诉讼,因为罪恶极的人也应当出庭接受审判。



●《手术剧场》

本书通过外科手术、解剖和器械的珍贵历史图像,为读者呈现了手术从流血、疼痛、死亡到止血、麻醉、消毒的漫长历史。这部历史,一面是血腥与恐怖的切割与重建,与酷刑无异;一面是非凡与无畏的革新与尝试,与先驱同行。穿插于图像之间的,还有8篇融合了医学与史学观点的短文。更重要的是,本书提供了外科手术中的患者视角,外科学在19世纪从边缘学科向主流不断发展的同时,病患已不再是沉默的参与者。